

钱塘吴氏与瓶花斋书事考述

郑 幸

提要:清代杭州吴焯、吴城父子及其经营的瓶花斋,不仅以藏书名闻天下,也是清中叶杭州文人重要的雅集场所。其间之人物往来、宴咏风雅,于杭郡文事之兴乃至“浙派”之起,皆有一定关联。本文以吴氏家族之藏书活动为中心,对瓶花斋之基本概况、藏书聚散等所谓“书事”详作考订。同时亦特别关注瓶花斋藏书、雅集与狭义“浙派”诸多文学活动之间的关联,并试图从这一侧面反映清中叶杭州文坛之文人心态。

关键词: 瓶花斋 藏书 吴焯 吴城 浙派

作者郑幸,女,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44)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7.01.015

清代杭州吴氏瓶花斋之名,向与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天津查氏水西庄以及杭州赵氏小山堂等著名私家藏书楼相埒。对此,袁枚《随园诗话》曾云:

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干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斋。名流宴咏,殆无虚日。^①

袁枚以“商人士大夫”来总称这一类藏书家,以其皆能以商人背景而投身文化事业,即今日“士商”、“儒商”之谓者。他们既有财力积聚丰富的藏书,又有能力召集、汇集当地之文化名流,即所谓“蓄积书史、广开坛坫”。这也正是清前中期江南等富庶之地所兴起的一种典型的文化形态,对其周边之文人及文化活动可谓影响深远。

惟诸藏书家中,扬州马氏、杭州赵氏、天津查氏皆多有关注者^②,而吴焯瓶花斋则罕见专文论及。事实上,四家之中,吴焯年岁最长,瓶花斋藏书也早有声名。洪亮吉曾在《北江诗话》中将藏书家分为数等,其中第三等曰“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匱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流览”者^③,所及则天一阁范氏、传是楼徐氏以及瓶花斋吴氏,尤高黄丕烈、鲍廷博一等。且瓶花斋之藏书与雅集,于杭郡文事之兴乃至“浙派”之起,皆有一定的关联。其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因撰此小文,以就正于学界。

^①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三第六十则,清乾隆嘉庆间随园增刻本。

^② 有代表性的如严迪昌先生《往事惊心叫断鸿——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与雍、乾之际广陵文学集群》、《谁翻旧事作新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等文。

^③ [清]洪亮吉:《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5册,第2271页。

一、瓶花斋及其藏书之聚散

按瓶花斋之得名，缘其庭院植小琼花，又呼瓶花，故名之。^① 据《两浙輶轩录》引朱文藻语，瓶花斋“在九曲巷口，与汪氏振绮堂南北衡宇相望”^②。又据柯汝霖《武林第宅考》载：

吴尺凫瓶花斋在荐桥，见《药园诗集》。厉樊榭《踏灯词》有“诗人家住荐桥街”之句。按药园在城东……内有瓶花斋、青萝书屋、鉴阁、霏红台、香白榭、听雪亭、寒翠楼诸胜。瓶花斋为药园之一。^③

检《武林坊巷志》，“荐桥”与“九曲巷”皆属“芝松坊”^④，即今杭州上城区清泰街、九曲巷一带^⑤，与汪氏振绮堂所在之“馆驿后”属同一坊。按汪氏振绮堂为杭州另一著名的私家藏书楼。据朱文藻回忆，瓶花斋与振绮堂相邻，“两家皆嗜藏书、精校勘，常各出所藏互相借抄。余馆振绮堂整比书籍，因得常诣先生（按：指吴焯子吴城）讨论古籍，间亦预觞咏之会”^⑥，可见彼此往来频繁。而此“芝松坊”以及相邻之“松盛坊”内，所居尚有毛先舒、柴绍炳、严沆、杭世骏、许宗彦等人，皆当时名流。其中许氏鉴止水斋、杭氏道古堂与汪氏振绮堂一样，亦杭州著名的私家藏书楼。

又柯汝霖云“瓶花斋为药园之一”，并罗列药园诸多亭阁名。按此“药园”系吴焯祖父吴名溢（号我匏）所筑。厉鹗《东城杂记》载：

药园在东城隅，与皋园相望。明季吴文学我匏构。轩槛虚敞，竹木萧森。玉照堂前玉兰一株，大可数抱，高花如雪，盖百余年物。康熙中，萧山毛西河太史奇龄与吾杭诸名士集此作送春诗，时囊笔数十人，多有佳句……^⑦

今吴焯早年诗集题《药园诗稿》，即以此园名集。惟瓶花斋并非吴名溢所建，而系吴焯新筑。金埴《不下带编》提及瓶花斋之筑云：

壬午、癸未间，红兰亲图瓶花一幅，赐寄吴子尺凫焯于瓶花斋。风致天然，白描神品。尺凫，钱塘才士。斋，其新筑也。予与尺凫，三十年契好，常得游息于此。^⑧

按此“壬午、癸未间”当指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1702—1703）。“红兰”指清宗室爱新觉罗·岳瑞，号红兰主人。其作瓶花之画以赠吴焯，当以其时书斋新成之故。

瓶花斋筑成后，即成为吴氏读书、藏书之所。徐倬《瓶花斋看画记》曾记康熙四十五年（1706）受邀至瓶花斋看画的经历，并描述所见曰“斋甚修洁，疏帘素槛，图书罗列其中”^⑨。瓶花斋在吴焯的经营下，很快就以藏书名闻天下。厉鹗称“尽出囊中金，万卷购连屋”^⑩，汪沆《吴太学家传》则称其“喜聚

① 民国《杭州府志》卷七十八“物产”：“小琼花……即今瓶儿花也，亦呼瓶兰，又呼瓶花。康熙间吴尺凫征君斋庭有之，故曰瓶花斋。今老屋犹存，庭柯无恙。秋结朱实累累然，如山柿而小。此花此果，皆非经见者。”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册第393页。

②⑥ [清]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二十一“吴城”条，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683册，第677、677页。

③ [清]柯汝霖：《武林第宅考》，收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9册第365页。

④ [清]丁丙：《武林坊巷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册第7、74页。又柯汝霖所引厉鹗诗见《樊榭山房集·续集》卷六《元夕集吴瓯亭斋中赋武林踏灯词四首》其二，下有小字注云：“明瞿长史宗吉居荐桥，见《归田诗话》，有灯词十五首。瓯亭亦居此地。”诗系于乾隆十三年（174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59页。

⑤ 按《武林坊巷志》将吴氏众人诗文、传记置于相邻之“松盛坊”下“严衙弄”条（同前第4册第487—512页），而行文中惟见九曲巷、荐桥，未及严衙弄，可知有误。又民国时吴昌绶在吴焯《径山游草》跋语中称“吾宗尺凫先生瓶花斋故居在杭州马市街”，所谓“马市街”属“如松坊”，实为许宗彦鉴止水斋之所在。

⑦ [清]厉鹗：《东城杂记》卷上《药园送春句》，清粤雅堂丛书本。

⑧ [清]金埴：《不下带编》卷五，中华书局，1982年，第90页。

⑨ [清]徐倬：《修吉堂文稿》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集部第245册第717页。

⑩ [清]厉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二《和吴敦复题重得先人旧藏宋刻丁卯集后》，同前第1072页。

书”，“凡宋雕元槧与旧家善本，若饥渴之于饮食，求必犹而后已”^①。张燧《吴绣谷先生行状》所述则更为详细：

先生藏书不下数万卷，元钞宋槧，购常不贖。一书必兼数本相参比，有所举正，辄疏其颠末而甄识之，海内证索家推为第一。性强干，居常应会酬答，率尽朝晡。稍隙，辄坐瓶花斋，签帙纵横，手自点勘，至夜分乃罢。^②

文中提及吴焯藏书多达“数万卷”，且所藏书必手自校订，而瓶花斋正是他日常诵读、校勘藏书的主要场所。惟赵嘉楫曾云“辟榭曰瓶花、曰青萝、曰鉴阁，各聚书万余种”^③，此皆药园之亭阁名，可见药园藏书之所当为以上三地，后人则多以“瓶花斋”总称之。

除“瓶花斋”之外，吴焯晚年又于药园内植古藤一本，构亭曰“绣谷”，并以自号。其子吴城、吴玉墀辑家传书目，亦名曰《绣谷亭熏习录》，后人亦时有以“绣谷”代指吴氏藏书者。今其钞本版心尚有“绣谷亭”字样^④。关于绣谷亭，汪沆《吴太学家传》曾描述云：

家有绣谷亭，亭前朱藤一本，为尺凫翁手自携植。岁月寢久，轮囷盘曲，枝叶上升于架，阴庇四檐。君爱护唯谨。花时柔条下垂如瓔珞，蜂喧邻巷，必置酒高会。

可见，瓶花斋以藏书名，绣谷亭以赏花名，此堪称吴氏药园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处景致。

经吴氏父子两代藏书，瓶花斋聚书之富乃名闻天下。焯长子城能承父业，不仅“子守书无失”^⑤，且能“插架所未备者，搜求校勘，数十年丹黄不去手”^⑥。其时藏书虽亦有散失，所谓“数十年来，或久假于戚友不归，或遭胥篋以去，多有散遗”^⑦，但总体而言，仍以积聚为主。乾隆元年（1736），吴城游历北京时尚重新购得吴焯散失之宋本《丁卯集》，并遍召同人倡和，乃成一时佳话^⑧。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馆，吴氏献书三〇五种，于浙省诸多私家藏书中，仅次于范氏天一阁、鲍氏知不足斋与汪氏开万楼，因获赐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一部，以示嘉奖^⑨。

后人在述及瓶花斋藏书之盛时，常以进献四库馆之殊荣为例，殊不知瓶花斋自此以后亦开始走向衰落。其时吴焯、吴城父子俱已去世，瓶花斋藏书归焯季子吴玉墀经营。玉墀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中顺天举人后，历官太平县教谕、天柱知县，晚年更远官贵州，其好友应澧因而叹息“一官远去，瓶花斋连遭邻火，藏书散失，十无二三”^⑩。其时吴氏后人中，惟吴城之孙吴荀龙尚能继承家风。按荀龙字双有，号云颿，吴城次子中麟之子。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官乌程教谕。《杭郡诗续辑》云其能“取先世藏书读之，一时有小万卷楼之目”^⑪，然亦未见有继承藏书职志的记载。

至嘉庆二年（1797）吴玉墀去世^⑫，瓶花斋藏书更是无人打理。后人多据黄丕烈所作宋本《新定续

① [清]汪沆：《槐塘文稿》卷三《吴太学家传》，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1册第466—467页。按：下引《吴太学家传》均据此本。

② [清]张燧：《南漪先生遗集》卷四《吴绣谷先生行状》，清刻本。按：下引《吴绣谷先生行状》均据此本。

③ [清]阮元：《两浙轩轾录》卷十五“吴焯”条引赵嘉楫序略，版本同前，第531页。

④ 上海图书馆藏清钞本《箫台公餘词》，其版心下方有“钱唐吴氏绣谷亭抄”字样。又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明以来之钞本”条：“吴尺凫钞本，板心有‘绣谷亭’三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

⑤ [清]厉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五《亡友吴绣谷墓下作》，版本同前，第1370页。

⑥ 民国《杭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五“文苑二”，版本同前，第3册第469页。

⑦ 汪沆：《槐塘文稿》卷三《吴太学家传》，同前。

⑧ [清]阮元：《两浙轩轾录》卷二十一有吴城《先君子旧藏许浑丁卯集失去二十余年余于京师重得之以归先子图章宛然简端抚今悼昔因得长律三首》，版本同前，第677页。另友人汪沆、赵昱、金志章等均有诗。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五九条“浙江巡抚三宝奏鲍士恭等五家呈献遗书等事折”：“计鲍士恭家有六百二十六种，吴玉墀家有三百五十种，汪启淑家有五百二十四种，孙仰曾家有二百三十一种，汪汝璣家有二百十九种，共一千九百零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7—98页。

⑩ [清]应澧：《闇然室文稿》卷三《吴小谷诗集序》，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⑪ [清]吴振棫：《国朝杭郡诗续辑》卷二十四，清光绪二年刻本。

⑫ 按应澧《吴小谷诗集序》有“小谷以嘉庆二年没”之语，可知其卒年；又文中有“而年已七十矣”，则其当生于雍正五年（1727）前后。此外，文中尚有“而小谷失怙，才数岁”之语，其父吴焯卒于雍正十一年（1733），如以雍正五年生计，其时玉墀七岁，亦相吻合。

志》跋,推断瓶花斋藏书在嘉庆五年庚申(1800)前后曾大量散出:

岁庚申,闻浙省书坊从故家买得旧志书几至充栋……是书之来,湖人施锦章为我向伊亲陶士秀处访来。所云故家,未知谁何。卷中有“吴焯尺帛”、“西泠吴氏”图章,当是瓶花斋物也。先是士秀以番钱四枚买得宋刻《司马温公集》,易余六十金而去。今闻其得故家书有三间屋,价止青蚨二十四两,令人可叹可笑。此书以白金卅金相易,则其他之直钱,不从可推乎。^①

此《新定续志》有吴焯藏印,想必是瓶花斋早年收藏之物。惟细味文意,黄氏当时所见仅此一种,并据印章断其主人,但对散书之“故家”并未遽下结论,仅云“未知谁何”。若此部《新定续志》系旧藏瓶花斋而后流入“故家”者,似亦能说通。否则吴玉墀去世仅三年,其后人亦非无知无学者,以区区二十四两贱卖三屋藏书,实在有些骇人听闻了。且应澧于嘉庆十年(1805)前后为吴玉墀诗集作序时,云瓶花斋藏书散失主要是因为“连遭邻火”,当非无据之说。

但无论如何,瓶花斋藏书在嘉庆初年大量散失,也是不争的事实。林申清认为瓶花斋藏书“散出后多归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德清许氏鉴止水斋和同邑汪氏振绮堂”^②,这也是学界比较通行的看法。此外,张鉴作于道光十四年(1834)的《秀水计氏泽存楼藏书记》,则提及“就所见瓶花斋之散,吾友眠琴山馆得其《苕溪集》,德清许部曹得其《隶释》、《隶续》,皆旧钞本”^③,所及则尚有南浔刘桐眠琴山馆(德清许部曹即许宗彦鉴止水斋)。同书《眠琴山馆藏书目序》又云“适值卢氏抱经堂、吴氏瓶花斋雠校精本散出四方,于是疏雨所收之富,又越从前数倍”^④,则所得当不止《苕溪集》一部。按刘桐歿于嘉庆八年(1803),则瓶花斋藏书于其时想必确实已经零落殆尽了。

二、吴焯家世及其士商身份

钱塘吴氏原籍安徽歙县,晚明时迁居杭城。焯祖吴名溢,字竖知,号我匏,前明诸生。康熙《钱塘县志》载其传略云:

吴名溢字我匏,崇祯二年补钱塘诸生。时复社方行,娄东甬上,诸名宿舟车络绎,溢皆与焉。鼎革后,弃举子业,不复出。两丧皆庐墓,著《丧礼注》。晚年构药园于城东,与严沆、查继佐、柴绍炳、关键、丁文策、袁于令、祁豸佳、吴山涛辈觞咏其中,有《药园盍簪集》。查继佐序云:明季文体诡变,尚诸子百家、仙释语录聱牙佶屈之文,溢乃沉酣六经,蔚以实义,作《麟经诠解》。考三传互异,折衷诸家,为《春秋详注》。严司农沆尝语人云:林峦标致,当推是公。非晚近人物。卒年七十有六。^⑤

据传略可知,吴名溢在明末曾与复社,即所谓“以学行著声复社”^⑥。明清鼎革后,乃“弃举子业,不复出”,所结交者则多为明遗民。平生专研经学,尤邃于《春秋》。所谓“沉酣六经,蔚以实义”,在鼎革之际尤有深意。

其子维桢,字左廷。康熙《钱塘县志》载其传略,录之如下:

吴维桢字左廷,幼随父名溢授经。名溢名噪复社,维桢以总角从。遭岁荒,辍业,年十六事居积,奉养二亲,垂白同孺慕。年六十馀,遭母丧,哀毁骨立。当亲在,与弟嘉枚同室居。女兄贫,迎养于家,终其身。桢性伉直,不屑屑与人寒温。及人有患难缓急,辄推解排救,不少靳事,己无德

① [清]黄丕烈:《菴圃藏书题识》卷三《新定续志十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170—172页。

② 林申清:《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③④ [清]张鉴:《冬青馆甲集》卷四,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92册,第47、52页。

⑤ [清]康熙《钱塘县志》卷二“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4册第418页。

⑥ [清]张增:《南谿先生遗集》卷四《吴绣谷先生行状》,版本同前。

色。尤笃族谊。方闽逆煽乱，民间被俘子女，捐千金倡赎。事闻，制府李公之芳深奖异焉。以子炳官封国子监学正。寿终八十有六。^①

文中提到维桢十六岁“事居积”，当指吴氏家族从事盐业贸易。张燧《吴绣谷先生行状》称吴家“以盐策起”，汪沆《吴太学家传》亦云“君家故业鹺”，其父名溢于《两浙盐法志》中亦列名于商籍^②。而从吴氏家世看，其高祖自歙迁杭，约在明万历年间，正是徽州盐商大批南下移居之际。两淮、两浙盐场又是明清徽商最活跃的区域，故扬州、杭州等地，汇聚了大批徽籍商人。《两浙盐法志》中所载钱塘吴氏，多从歙县或休宁等地来，此当其时同南迁者。

维桢生七子，吴焯其仲。焯(1676—1733)字尺鳧，别字绣谷，晚号绣谷老人。岁贡生。据张燧《吴绣谷先生行状》，焯绍父业，而“神识通敏，详闲时要，所指切处奏并中机宜，当事多向纳之”。雍正七年(1729)，浙江总督李卫以吴焯“尚义急公，有裨鹺政”，而疏请议叙正八品用。盐务之外，吴焯亦有文名。传其九岁能诗，弱冠后则以“诗古文擅名东南”^③，论诗者称能“别出机杼，令人可想”^④。中年后始为词，厉鹗称在周邦彦、张炎诸人间。诗文之外，亦精小学，尝与无锡朱襄同析《说文》。又能熟知杭城古迹，作《武林金石考》。雍正九年(1731)，受聘与修《浙江通志》、《西湖志》“古迹”一门，“考证详确，多人所未发”。著有《药园诗稿》二卷、《渚陆鸿飞集》一卷、《玲珑帘词》一卷、《南宋杂事诗》一卷，皆刊布行世；另有《绣谷文集》、《蝉花集》等未刊稿二十馀卷。

吴焯有弟燿、问郊，皆有文名。燿字西庚，号叔子，钱塘贡生。《杭郡诗辑》称“叔子兄绣谷、弟浣陵，缟纈遍海内，而叔子独闭门自守”^⑤。又问郊字浣陵，初字皖轮。康熙五十九年举人(1720)，官通州知州。《杭郡诗辑》称“浣陵与兄绣谷焯、叔子燿，皆有声于时。而绣谷、浣陵交游声气尤广”^⑥。

焯有三子，长子吴城(1701—1772)，字敦复，号瓯亭；次子玉垣，字右承；季子玉墀(约1727—1797)，字兰陵，号小谷。初，以长子城继承盐务，然“中年以往，不耐烦嚣，举而委诸仲弟玉垣”^⑦。至吴城孙辈吴荀龙，则云“家故饶，出入听典守者，不问盈缩，生计日绌”^⑧，家业渐趋式微。然而瓯亭、小谷兄弟在学问、文名乃至仕途上，都小有成就。汪沆《吴太学家传》称吴城“诗独擅性灵，苍秀拔俗，一洗调铅杀粉之习，四座传观，莫不激赏”，晚年又一心向佛，杜门却轨，常趺坐于瓶花斋，以整理乡邦文献为职志；玉墀早年为诗“出入中晚唐”，三十以后则“沉潜经史，贯串百家”^⑨，乾隆三十五年(1770)成举人后远宦他乡。

无论是张燧的行状、汪沆的家传，还是《钱塘县志》、《杭郡诗辑》等所载传略，于吴氏家世，多侧重述其藏书、学识及文学造诣，乃至与前辈文人的交往往来等，至于其盐商之背景、从商之经历，则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事实上，大规模的私家藏书必须有丰厚资产作为保障，其中尤以经商能够迅速实现财富的积聚。这也是明清私人藏书家多商人背景的重要原因。而杭州、扬州等地的藏书家，则尤以徽州盐商居多^⑩。袁枚将他们概括为“商人士大夫”，不亦宜乎？

然而以追逐利益为职志的商人，与不求功利的文士，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调和？袁枚在述及

① [清]康熙《钱塘县志》卷二十五“耆善”，版本同前，第453页。

② 《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卷二十五“商籍二”，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41册第566页。

③⑦ [清]汪沆：《槐塘文集》卷三《吴太学家传》，版本同前。

④ [清]查为仁：《莲坡诗话》第一一条，收入《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9页。

⑤ [清]吴颢、吴振棫：《杭郡诗辑》卷十四，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⑥ [清]吴颢、吴振棫：《杭郡诗辑》卷九，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⑧ [清]吴振棫：《国朝杭郡诗续辑》卷二十四，清光绪二年刻本。

⑨ 以上所引皆见[清]汪沆：《槐塘文稿》卷三《吴太学家传》，版本同前。

⑩ 杭州如振绮堂主人汪宪，即明末黟县盐商汪元台的后人；又如开万楼主人汪启淑、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亦歙县盐商而移居杭州者。扬州则小玲珑山馆马氏、康山草堂江氏，均为人所熟知。

马氏小玲珑山馆之盛时,末亦感叹“至今未三十年,诸诗人零落殆尽,而商人亦无能知风雅者”^①。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知风雅的商人往往倾向于为自己(或其子孙)谋求更进一步的士大夫身份,而这一点恰恰会破坏“士商”二字之间微妙的平衡。从吴焯“屑屑从举场四十馀年”,到吴城于盐业“不耐烦器”而专事文事,至最后瓶花斋藏书之大量散失,更与吴玉墀“捷北雍”后远官贵州有关。对文士乃至仕宦身份的追求,不仅会耗费大量的金钱,而且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其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如淮安盐商兼藏书家程晋芳,“家本富商,交结文人,家资荡尽”,虽成进士,却晚景凄凉^②,诸如此类的典型案例,实数不胜数。

三、瓶花雅集与浙派文事

对于徽商好事风雅这一点,历来论述已多。而藏书与雅集,向来被视为这些风雅儒商们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袁枚“蓄积书史,广开坛坫”二语,可谓贴切。然而,瓶花斋藏书之名今日或犹闻,其雅集之盛却已罕见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事实上,时人在谈及钱塘吴氏及其瓶花斋时,亦多以其为风雅坛坫。如赵嘉楫曾云:“四方骚雅游屐至武林,鲜不延接把臂,或下榻经年,讲求摩切”^③。又魏之琇诗云:“武林吴氏号诗藪,亭子倚花名绣谷。雅集当时多胜流,豪吟迨日尚耆宿。”^④一句“诗藪”,实概括了其时雅集之盛况。故吴氏后人吴用威在追怀先人事迹时称:“康熙中门祚寔盛,一时群从多以谈艺好客相尚,而绣谷先生尤为眉目。瓶花雅集,东南称诗藪焉。”^⑤此殆非虚语。

吴焯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前后筑瓶花斋,故严格意义上的“瓶花斋雅集”当自此始。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厉鹗这一批被后人称为狭义“浙派”者,开始渐有文名。吴焯以前辈身份与之结交,相与甚欢,而瓶花斋亦成为其宴饮文聚的重要场所之一。按吴焯与厉鹗之往来不知始于何时。据朱文藻《厉樊榭先生年谱》,厉鹗于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七年间(1714—1718),馆于汪舍亭、汪沆父子之听雨楼。楼在“松盛坊”所属之“横大方伯里”,与瓶花斋相隔不远,其时或已与吴氏有往来。今检《樊榭山房集》,可见到大量厉鹗与吴焯、吴城父子同游、唱和之作,可见二人往来之频繁。

此外,杭世骏道古堂亦在横大方伯里,其与瓶花斋吴氏之往来亦当颇早。杭世骏有《赵谷林爱日堂吟稿序》,叙其与同时诸人之情谊曰:

余少时锐意科举之学,先师又禁不得为诗。后得交于赵氏谷林昆季。谷林有园亭,甲于通邑。其时沈个庭、符药林两诗人皆主其家,尝所往来;吴明经绣谷、厉孝廉樊榭及余三人,则蒋径之羊求也。^⑥

文中“赵氏谷林昆季”即指小山堂主人赵昱(1689—1747,号谷林)、赵信(1703—1765,号意林)兄弟,亦以藏书而闻名。吴焯往来其中,亦常以藏书互通有无。赵昱在回忆与吴焯的交往时,曾云:“绣谷藏书颇矜惜,不轻借人,独许予钞,予所藏多绣谷亭本。予偶得善册,先生见之亦必取以勘定。”^⑦可见情好之笃。个庭、药林则分别指沈嘉辙、符曾,亦浙派中人,时馆于赵氏。

雍正元年至二年(1723—1724),上述六人(吴焯、厉鹗、赵昱、赵信、沈嘉辙、符曾)加上陈芝光,凡七人,共赋《南宋杂事诗》七百零一首。其“凡例”云为补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馀》而作,

①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三第六十三条,清乾隆嘉庆间随园增刻本。

② [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第九条,清乾隆嘉庆间随园增刻本。

③ [清]阮元:《两浙轺轩录》卷十五“吴焯”条引赵嘉楫序略,版本同前,第531页。

④ [清]吴颢、吴振棫:《杭郡诗辑》卷十四“吴焯”条转引,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⑤ [清]吴焯:《药园诗稿》卷末,民国十二年重印本。

⑥ [清]杭世骏:《道古堂全集·文集》卷九,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26册第290页。

⑦ [清]丁申:《武林藏书录》“绣谷瓶花斋”,收入《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年,第66册第46页。

实际是一部以吟咏南宋都城杭州旧史为题材的诗歌总集。诗下有注,以搜集、记载掌故轶闻为主。严迪昌先生将《南宋杂事诗》之撰视为“异代‘梦梁’的群体选择”^①,别具慧眼。而在笔者看来,此集更为直接的一个作用,却是进一步推动了狭义“浙派”诗人群的崛起。袁枚《随园诗话》曾云:“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②后人乃以“宗宋”、“好典”、“重学”等为浙派诗的主要特征,而以厉鹗为狭义“浙派”的代表人物。厉鹗一生编纂了大量与宋代有关的著述,最称名者如《宋诗纪事》一百卷、《绝妙好词笺》七卷等。然以时间计,《南宋杂事诗》之创作实为最早。

而此书之编纂,与吴氏瓶花斋之藏书亦关联紧密。《南宋杂事诗》卷首“引用书目”多达近千种,其中尤多宋元人著述,而这也正是瓶花斋藏书之特色。尤其是集中大量引用的南宋“江湖”诗人之别集,当时颇为罕见,吴焯倾十馀年之力苦心搜求,始得其大概。雍正三年(1725)除夜,即《南宋杂事诗》撰成后不久,吴焯为《南宋群贤小集》作序云:

余搜求不下十年,始汇其全。近日与赵谷林校勘此集,因书其端委示之。惜乎竹垞已往,不及见余本之完善。忆曩日落帆亭舟中对话,老人深叹曹氏藏本之佳,而不知其不全。余生行都旧地,遥遥白云,怀古何深,实甚快焉。^③

按文中所及之“曹氏藏本”,即吴焯钞本所据之宋刻底本,曾先后经曹寅、郎温勤、吴允嘉收藏,吴焯即由吴允嘉借钞而得,但也“仅有其半”而已,吴焯乃为补足之。今《南宋杂事诗》卷首尚有吴允嘉题诗,末云“手把此编和泪读,斜阳衰草自悲风”,其中感触,或亦与“江湖”集之再全有关。按允嘉歿后,宋刻由厉鹗代购,归藏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此时吴焯当已去世。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一说四十七年),此书再次散出,入苏州书贾钱景开手,并转售苏州汪雪疆,汪氏歿后则不复再闻,直至近代才始现世^④。此外传世之赵氏小山堂本、汪氏振绮堂本、鲍氏知不足斋本,则皆由瓶花斋而来。

吴焯去世后,瓶花斋由其长子吴城继承。应澧《吴小谷诗集序》称“绣谷先生博学工书诗,编约之交遍天下。伯子毳亭开设坛坫,风雅接武”^⑤,可见瓶花雅集之盛事在吴城的主持之下得到了延续。事实上,就现有文献来看,由吴城主持的瓶花雅集次数更多亦更频率。这应该与雍乾之际“浙派”之诗人群体渐趋兴盛有关。而吴城与浙派诸人年龄相仿,又参与了以厉鹗、杭世骏、丁敬、金农、汪沆等人为主的“南屏诗社”,故瓶花斋也终成诗社诸人游宴雅集的一个重要据点^⑥。今检厉鹗、杭世骏等人的诗文中,均留下了大量于瓶花斋宴集、倡和的诗作。如厉鹗《樊榭山房集》中,乾隆三年(1738)正月九日^⑦、乾隆九年(1744)正月十五日^⑧,均有瓶花斋雅集之事。而乾隆十一年(1746)十二月八日腊八粥联句之集^⑨,与会者有吴城、周京、金志章、厉鹗、梁启心、丁敬、杭世骏、全祖望、顾之麟、丁健、汪启淑,凡十一人;稍后之“食蟹联句”^⑩,与会者更多达十四人。由此,则瓶花斋雅集之盛亦可略见一斑。

乾隆三十八年(1773),吴城去世。其弟吴玉墀时已中举,不久即远宦他乡。乾隆五十八年(1793),洪亮吉于黔中遇吴玉墀,犹赠诗云“瓶花斋中书有目,不减鲍家知不足。搜罗各本元宋明,天

① 严迪昌:《谁翻旧事作新闻——杭州小山堂赵氏的“旷亭”情结与〈南宋杂事诗〉》,《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② [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九第八十三条,清乾隆嘉庆间随园增刻本。

③ 见《南宋群贤小集》卷首,清嘉庆六年石门顾氏读画斋重刻本。

④ 鲍廷博:《南宋群贤小集目录跋》,转引自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卷七《江湖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328—330页。而据顾廷龙:《南宋书棚本江湖小集经眼记》,此书于1947年重现,顾廷龙先生尝经眼,后归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见《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87—492页。

⑤ [清]应澧:《闇然室文稿》卷三,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⑥ 关于“南屏诗社”,可参看拙文《南屏诗社考》,《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⑦ [清]厉鹗:《樊榭山房集》卷八有《正月九日夜同人集饮绣谷亭限灯字》,与会者有厉鹗、符之恒等。版本同前,第627页。

⑧ [清]厉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四有《元夕雨中集吴敦复瓶花斋分得何字》,在座者尚有梁启心、周京、陈兆仑、陆秩等人。版本同前,第1233页。

⑨ [清]杭世骏:《道古堂诗集》卷十五有《瓶花斋食腊八粥联句》,版本同前,第115—116页。此外,丁敬《砚林诗集》卷二、厉鹗《樊榭山房集·续集》卷六、汪启淑《切庵诗存》卷二皆有同题之作。

⑩ [清]杭世骏:《道古堂诗集》卷十五有《十月十二日集瓶花斋对菊食蟹联句》,版本同前,第118页。

一阁中无此精”^①，而不知其时瓶花斋已然乏人打理，而藏书亦日渐散失矣。应澧在《吴小谷诗集序》曾惋惜道：

夫小谷之才之学，使抱其先世遗书，以著作闻警组，何足以易之。而一官远去，瓶花斋连遭邻火，藏书散失，十无二三，贻悔厥心。平生出处，天若有限断于其间，使不得为刘壮舆、晁子止一辈人，而以诗人终，夫岂小谷之志哉！^②

在此文中，应澧一方面肯定玉墀为官后的诗作“眼界既宽、格律益峻”，然而也婉转地批评了其因“一官远去”而不能谨守家学、有所著述，并导致瓶花斋藏书之散失。嘉庆二年（1797），吴玉墀歿后返枢杭州时，应澧又作《吴小谷丧自黔归》一诗，诗中“宦味浓酣老中醒”、“一官容易送浮生”等语^③，读来尤令人唏嘘。至此，则不特瓶花斋藏书渐散，其雅集之盛事亦不复再见矣。

四、余 论

在《杭郡诗辑》所载吴焯小传中，有一段文字罕见人提及，读来却颇耐人寻味。其文云：

雍正癸丑秋，招客游湖上，指败荷一本，谓座客曰：“此名士下场头矣。”闻者黯然。未几竟卒。^④

文中以“败荷”喻名士下场，虽未明言其所指，然其中悲怆、凄凉之情，实不言而喻，以故“闻者黯然”。而若予以深究，这种“名士如败荷”之感慨显然并不仅仅着眼于个人之身世，更有一种对所处之环境、时世的不安与失望。

按“败荷”语发于“雍正癸丑”，即雍正十一年（1733）。是年四月，雍正下诏命各省荐举才士，开博学宏词之科。而据张燧《吴綉谷先生行状》记载，时“浙省有司首拟上先生名，予友杭君世骏亦自京师贻书劝驾，先生答以诗，有‘野人自信非毛遂，先达何缘荐陆机’之句”，可知吴焯当时并未与选。同年九月，吴焯即以病卒。张燧对此事表示可惜，并将此解释为“盖其时已婴疾，入秋遂不起矣”，认为是客观原因所致。其行状末尾，更有针对此事的一段评论云：

先生少壮发闻于东南，士论皆以宜充本朝备著作，顾屑屑从举场四十馀年，卒无所遇。方今朝廷辟大科，公卿交相论荐，此亦班、扬之选何异？而先生又遽已奄忽，不能以其身待，盖其命也。据行状，吴焯十六岁成秀才，五十八岁卒，所谓“从举场四十馀年”者，盖指此。张燧将此视为命运不济，却似乎忽略了吴氏此前“败荷”与“野人自信非毛遂”等语。显然，在经历了康雍之际严厉的文化制度以及数十年的不第经历后，吴焯对功名、名士的期待恐怕早已消磨殆尽。

及至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清世宗再次下诏，以“降旨已及两年而外省之奏荐者寥寥无几”，尤其是“江浙两省人材众多之地，至今未见题达”，鸿博之试才正式开始启动。至乾隆元年，应诏之士中包括了众多吴焯当年之好友，如厉鹗、杭世骏、赵昱、赵信、汪沆、汪台、傅王露、陈兆仑等人，皆往应选，惟中式者，不过杭世骏、陈兆仑等区区数人而已。未数年，杭世骏即以议满汉之见而触怒乾隆，罢归还乡。则吴焯当年“名士如败荷”之喻，诚为灼见。

责任编辑：项义华

① [清]洪亮吉：《卷施阁诗集》卷十三《吴司马玉墀洗砚图》，版本同前，第2册第759页。

② [清]应澧：《闇然室文稿》卷三《吴小谷诗集序》，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③ [清]应澧：《闇然室诗存》卷六，版本同前。

④ [清]吴颢、吴振棫：《杭郡诗辑》卷十四“吴焯”条，清同治十三年刻本。